

SHIDAI YU

XINLING DE QIHE

时代与心灵的契合

—— 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与
前期创造社文学之关系

陈 遐 / 著



6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學出版社

时代与心灵的契合

——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与前期创造社文学之关系

浙江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时代与心灵的契合: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与前期创造社文学之关系/陈遐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6. 8

ISBN 7-308-04836-5

I. 时... II. 陈... III. 创造社 - 关系 - 文学 - 俄罗斯 - 十九世纪 IV. ①I209.6②I512.0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3764 号

责任编辑 石国华
封面设计 张作梅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28)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E-mail: zupress@mail.hz.zj.cn)
排 版 星云光电图文制作工作室
印 刷 浙江中恒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6
字 数 156 千
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308-04836-5/I · 174
定 价 1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072522



前 言

本书旨在揭示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与前期创造社文学的关系,藉此作为研究“俄罗斯文学与中国”的一种视角或一个侧面。

关于这一主题一些前辈大师(如智量先生)及众多资深学者已经有了深入的研究和精辟的论述,这些研究成果蕴涵了他们的智慧和激情,令人鼓舞和钦佩。遗憾的是,对这些成果至今没有做出系统的梳理、分析和整合。苏联解体(1991年)以来,人们对俄罗斯文学的关注也日渐稀少,没有进一步追索俄罗斯文学对现代中国的影响——这是不公平的。

1991—1993年我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读比较文学的研究生,师从著名俄国文学专家、翻译家智量先生。入学之初,第一次到先生家里,先生指着一书房的书说:三年内读完这些书!先生期待、关爱的神情仿佛就在眼前。也许是少不更事,也许是造化弄人……三年转瞬即逝,书没有读几本,却多次叫先生失望。回首往事,感世伤生,才知道师恩深重,而我负之。

“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与前期创造社文学之关系”,是先生“俄罗斯文学与中国”研究计划的一部分,也是我硕士论文的论题。今天的这部书,是硕士论文的扩展,其中寄托了我对文学的热爱之情和对先生的感恩之心——虽然,深知研究的深度是远不能令先生满意的。

我应特别感谢我的父母、兄长和丈夫孔一先生,没有他们的爱和宽容,就没有这本书,至少不是今天这个样子。

本书部分内容作为论文曾发表于《外国文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北方论丛》等杂志。本书得到了浙江警官职业学院专著项目基金的资助,也多蒙浙江大学出版社石国华先生的鼎力协助。一并致谢。

陈 遐

2006年5月1日于杭州桃源居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时代与心灵的契合	8
第二章 接受中的抉择:客观原因	25
第三章 精神上的朋友:内在基础	46
第四章 日本文学的中介作用	66
第五章 沉沦与反叛	79
第六章 忏悔的人与忏悔的意识	97
第七章 在浪漫主义契合点上的碰撞	116
结 论	129
附录一 林琴南先生简介	131
附录二 创造社大事记(1921—1930)	143
附录三 中英文摘要	179
参考文献	182

绪 论

平等的公民各有其不同的,因而也是不可公度、不可调和的善的观念,伯林的这个毕生信念对自由主义来说是核心性的。

——约翰·罗尔斯

十九世纪中叶,一直自诩为“天朝大国”、“中央之国”的清帝国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封闭的大门,受制于入侵者的暴力威胁,清政府不断地以土地和财富换取短暂的卑微和平。普通民众在遭受外敌压迫的同时,对政府产生了强烈的“信任危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也被严重削弱。从而,导致了整个民族的信仰崩解和认同困境。这种危机和困境在知识分子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和强烈。

十九世纪末,中国留学生严复^①读完《天演论》之后的那种欣喜,在其后的几十年里,一直断断续续地浸润在人们对传统的伦理道德以及其他文化领域的疑惑之中。回国后,严复迫不及待地把《天演论》译成佶屈聱牙的白话文,可惜知音寥寥无几。由《天演论序》即可见一斑:

^① 严复(1854—1921):初名体乾、传初,改名宗光,字又陵,后又易名复,字几道,晚号愈野老人,别号尊疑,又署天演哲学家。福建福州人。特赐文科进士出身,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教育家。

严子几道既译英人赫胥黎所著《天演论》，以示汝纶。曰：“为我序之。”天演者，西国格物家言也。其学以天择物竞二义，综万汇之本原，考动植之蕃耗，言治者取焉。因物变递嬗，深研乎质力聚散之几，推极乎古今万国盛衰兴坏之由，而大归以任天为治。赫胥氏起而尽变故说，以为天不可独任，要贵以人持天。以人持天，必究极乎天赋之能，使人治日即乎新，而后其国永存，而种族赖以不坠，是之谓与天争胜。而人之争天而胜天者，又皆天事之所苞。是故天行人治，同归天演。其为书奥赜纵横，博涉乎希腊、竺乾斯多噶、婆罗门、释迦诸学，审同析异而取其衷，吾国之所创闻也。凡赫胥氏之道具如此。斯以信美矣。抑汝纶之深有取于是书，则又以严子之雄于文，以为赫胥氏之指趣，得严子乃益明。自吾国之译西书，未有能及严子者也。

凡吾圣贤之教，上者道胜而文至，其次道稍亏矣，而文犹足以久。独文之不足，斯其道不能以徒存。六艺尚已，晚周以来，诸子各自名家，其文多可喜。其大要有集录之书，有自著之言。集录者，篇各为义，不相统贯，原于《诗》、《书》者也。自著者，建立一干，枝叶扶疏，原于《易》、《春秋》者也。汉之士争以撰著相高，其尤者，《太史公书》，继《春秋》而作，人治以著。扬子《太玄》，拟《易》为之，天行以阐。是皆所为一干而枝叶扶疏也。及唐中叶，而韩退之氏出，源本《诗》、《书》，一变而为集录之体，宋以来宗之。是故汉氏多撰著之编，唐、宋多集录之文，其大略也。集录既多，而向之所为撰著之体不复多见。间一有之，其文采不足以自发，知言者摈焉弗列也。独近世所传西人书，率皆一干而众枝，有合于汉氏之撰著。又惜吾国之译言者，大氏奔陋不文，不足传载其义。夫撰著之与集录，其体虽变，其要于文之能工，一而已。

今议者谓西人之学多吾所未闻，欲沦民智，莫善于译书。吾则

以谓今西书之流入吾国,适当吾文学靡敝之时,士大夫相矜尚以为学者,时文耳,公牍耳,说部耳。舍此三者,几无所为书。而是三者,固不足与于文学之事。今西书虽多新学,顾吾之士,以其时文、公牍、说部之词译而传之,有识者方鄙夷而不之顾,民智之沦何由?此无他,文不足焉故也。文如几道,可与言译书矣。往者释氏之入中国,中学未衰也,能者笔受,前后相望。顾其文自为一类,不与中国同。今赫胥氏之道,未知于释氏何如?然欲济其书于太史氏、扬氏之列,吾知其难也。即欲济之唐、宋作者,吾亦知其难也。严子一文之,而其书乃駸駸与晚周诸子相上下,然则文顾不重耶?抑严子之译是书,不惟自传其文而已。盖谓赫胥氏以人持天,以人治之日新,卫其种族之说,其义富,其辞危,使读焉者怵焉知变,于国论殆有助乎?是旨也,予又惑焉。凡为书,必与其时之学者相入,而后其效明,今学者方以时文、公牍、说部为学,而严子乃欲进之以可久之词,与晚周诸子相上下之书,吾俱其傑驰而不相入也。虽然,严子之意盖将有待也。待而得其人,则吾民之智沦矣。是又赫胥氏以人治归天演之一义也欤?

那时,翻译家林琴南^①正在商务印书馆的资助下,不遗余力地出版了一部又一部的西方文学名著的文言译本,《茶花女》、《黑奴吁天录》正在好奇的中国人手中传来传去,为人们茶余饭后增添谈资和近乎偷偷摸摸的憧憬。以鸳鸯蝴蝶派等旧派文人为首的一批传统文化的遗老遗少还垄断着空气窒息的文坛,想象力近乎贫乏地炮制着相互因袭、内容相近的才子佳人的故事传奇。辛苦之余的城市闲民也还偷空聚集在茶店书馆里,心不在焉地听说书先生讲述着《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演义》和《西游记》的故事。这是一个表面上自给自足的环境,从来没有人会想到,应该给

^① 林琴南(1852—1924):名纾,别署冷红生。福建闽县人。翻译家,画家。

泡了上千年的茶壶换换茶叶,调调口味。像阅读《天演论》这种类似精神自虐的行为,在那时简直不可思议。据不完全统计,仅十九世纪后十年二十世纪初的十余年间,才子佳人小说就将近200部(据《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这足够让还不发达的印刷出版业忙碌一番了(这还不包括古籍注疏和旧体诗集的出版)。因此,像《天演论》之类的精神食粮被深深地埋在尘埃污垢之下是不足为奇的。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想见,正是这枚带着坚壳的果子,使以鲁迅、郭沫若等人为代表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品尝到它甘美的汁液之后,完成了从机械师、医生到文学家的转变。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和批判,注定了他们殉道者的身份,注定了他们在现实的世界中将会饱受血雨腥风、苦闷彷徨和颠沛流离的洗练、折磨。在缺乏宗教情感的近现代中国社会里,他们扮演着反抗绝望的西西弗斯^①的角色。当时,在反对传统的气氛和日趋混乱的形势中,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纷纷从各方面寻找新的道路。一部分人,如李大钊、陈独秀,是采取社会和政治方面的行动;另一部分人,如鲁迅、茅盾、郭沫若,是采取创造新文学,建立新价值观、新意识的行动。两种行动的目的都是“救中国”,都是使中国得以进入现代世界的整体之中。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作家们如饥似渴地吞食着西方的思想和文学,寻找创作和表现的榜样。凡尔赛条约的签订或许动摇了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列强的信任,但他们确信必须学习西方文化的信念却不曾动摇。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家在短短的时期内,就不同程度地吸收了西方文学发展中经历过的全部思潮:

^① 西西弗斯,原是希腊神话中的负罪人物,被罚不停地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而石头由于自身的重量,又滚下山去。于是,他只得再次重复这一劳作,永无止息。但在二十世纪的诗哲加缪手中,西西弗斯被改造成成了一个英雄:他藐视神明,他接受了循环滚石这一荒谬责罚,并以诗意的激情,将之化为自己的命运与一种幸福。在这一觉醒中,西西弗斯获得了人的尊严,而神灵遁隐,他听到了沉默的世界升起了千万个美妙细小的声音。

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现代文学。这种现代文学不是很容易形成的。“五四”作家虽然有意地抛弃传统文学的形式,但仍然背负着沉重的传统影响。“五四”作家原是在中国旧传统中教养出来的,他们热情地模仿和汲取的西方的价值观和价值标准却是从另一种距离中国很远的社会文化中产生的。“五四”一代至少在形式上中断了传统的意义话语。他们从反叛“传统”中站出来,并积极地、迫不及待地要给意义话语重新定位,随之是重新定位后的坚信转化成的社会行动。^①“五四”作家正处在政治危机的时代。在一个弱国里,徘徊在精神、文化领域的知识分子注定是要历尽苦难的。但他们并不退缩、妥协。鲁迅先生的大声呐喊,郁达夫在《沉沦》里“祖国啊,祖国,你怎么还不富强起来”的痛苦呼唤,一次又一次地企图唤醒沉睡中的人们,但这却加深了他们对自身的认识、反省,陷入了发现自己深重痛苦的迷惘之中。早在1916年1月,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陈独秀就写道:“盖吾人自有史至1916年,于政治,于社会,于道德,于学术,所造之孽,所蒙之羞辱,虽倾江汉不可浣也。当此除旧布新之际,理应从头忏悔,改过自新。”接着,他暴露作为一个革命家、政治家而不是文学家的本质:“吾人首当一新其尽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以新家庭,以新民族。”^②这是一种美丽的梦想,它如此富有吸引力,不可避免地使一大批热血青年聚集到自己的麾下。陈独秀注意到,文化革命先于文学开始,不久,他就写了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学革命论》,刊在《新青年》上。《新青年》接着刊登了另一位新文化主将胡适的文章《文学改良刍议》,在激情上虽然与陈独秀有别,仍不啻一颗榴弹。作为文艺创作的实绩,紧随着鲁迅先生发表了中国第一部白话文小说《狂人日

① 刘小枫:《这一代人的怕和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

② 《新青年》1916年1月号,摘自《独秀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

记》。从其后的文学活动中可以看出,从《狂人日记》开始到文学研究会成立这一段时间里,文艺创作以揭露、控诉、针砭时世为主,带有浓重的文学为社会,为人生,“文以载道”的政治色彩。作为对它们的反驳,在文学社团中出现了初期与文学研究会观点相背的创造社。

仿佛是一个惊人的偶然巧合,俄罗斯“十二月党人”被流放之后的俄国文坛上,也笼罩着一层令人生厌的乌烟瘴气。新旧贵族们整天醉心于光荣、勋章与玩乐,醉心于疆土的漫游。在这些贵族之中(受过严格正规的教育,出身良好),有那么一些人,忽然意识到自身的尴尬地位,意识到作为一个有良心的人的艰难处境,也在纷纷寻找出路,表现在文学作品中是几个阶段的“多余人”形象。由于西方文学的浸润和优秀的艺术大师们的努力,十九世纪俄国文学放出了夺目的光彩,对那些正因各种原因留学日本,饱受精神折磨的青年中国知识分子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因此,郭沫若、郁达夫等人的志同道合绝不是偶然的。他们饱读西方各国和俄罗斯的文学名著,深所心仪,反观刚刚起步还嫌粗糙的新文学,他们对于成立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团体的热望急切起来,希望借此推动文学的发展,在中国新文学上出现自己的巨著。

创造社是新文学史上重要的文学社团之一。1921年7月,由留学日本的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成仿吾、田汉、郑伯奇、穆木天等人发起成立。创造社在文学创作和文艺观上可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部分。前期创造社在文学主张上,倾向浪漫主义,注重张扬个性,主张表现自我,强调内心刻画和主观感情的抒发,重视文学本身独立的艺术价值,同时,也没有完全放弃文学的社会使命、时代使命。事实上,从1925年五卅运动之后,创造社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成员的文学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26年春,郭沫若和郁达夫奔赴革命策源地广州,至此进入了创造社后期。1927年底,贯穿

创造社方向转换过程中的《洪水》“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1928年1月《文化批判》的创刊,标志着创造社完成了严格意义上的观念演变,从此,在变幻莫测的时代巨流里,“革命小说”取代了“身边小说”。但是,创造社的最重要的发起者郁达夫一直坚持着自己的文学主张,即使在题材大异的情况下,也不忘记对艺术风格的锤炼。他深深地眷恋着从俄罗斯,从屠格涅夫、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到托尔斯泰这些文学大师那里传来的大自然的馨香和艺术本身令人难以忘怀的魅力,不断撰文介绍俄国作家。1939年8月,远在新加坡的郁达夫写了《纪念柴霍夫》^①一文,表明即使在饱经沧桑之后的他,仍然对俄罗斯大师恋恋不舍。

事实上,创造社和俄罗斯文学的因缘是难以割裂的!1937年,在回国途经我国台湾省的一次座谈会上,郁达夫在回答主持人关于俄国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的提问时,指出它的影响是占主导地位。

本书即着重于探讨前期创造社与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之因承关系。

^① 《新青年》1916年1月号,《独秀文存》,上海远东书店1922年版。

第一章 时代与心灵的契合

整个人类文明史,以及文学史,是不断假借和相互影响的历史

.....

——《俄国文艺学史》

十七世纪以后,西方列强的势力正逐渐侵入亚洲,中国更成为列强竞逐的场所。经历了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一连串的挫败,使朝野部分有识之士体会到改革的重要。外来危机越深,改革呼声也就越高,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便是在这种危机与改革不断深化的情形下,前仆后继,犬牙交错。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一直对辫子和国土、文明有着无知般骄傲的“天朝大国”清帝国,正像潮水退去之后突兀在水面上的一块岩礁,面对着周围世界的翠绿、喧嚣,它感到的是贫瘠,饥饿,一无所有。那时,满朝上下的无知,简直令人惊讶。当道光皇帝问及法兰西在什么地方时,大臣们面面相觑,心里窃想:是呀,这些人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甚至有一大臣面无愧色地把《山海经》里的描述摘出来,胡诌了一通什么“去国万里”。这是一种极大的悲哀。^①鸦片战争的失败对清帝国的内在冲击远大于物质损失,这是第一次戳破“天朝”威严门面。^②

① 陈遐:《论日本文学的中介作用》,《北方论丛》2000年第6期。

②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一些社会精英逐渐认识到,面对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一个后发展的民族根本无法想象能在没有自己的强大国家作为后盾的情况下走上现代化的道路。^① 统治集团中一些有洞察力的大臣发起了“洋务运动”——“自强运动”。“自强运动”名称出自《易经》,由“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而来。用这标语概括 1860—1870 年中国大效西方,其名称已表现着防御性的动机。当日提倡向西方学习的人物恐怕自己的行动必被批判,因之引经据典强调时代之不同,才有这举动之必要。同时他们也用“中学为礼,西学为用”的解释说明学自西方的无非一种技术性的事物。在各种基本的条件内,他们始终不脱离中国文化的传统。^② 自强运动表示着一种意志单简的目的:中国希望借西方之科技以充实军事力量而已。改革者所需要的乃是轮船与枪炮,所以他们设立的是船坞与兵工厂。所有的改革也与其他部门隔离,以免妨碍旧有法制规章。所训练的“洋务”人才,预定为中国旧式官僚手下之技术助手,所以传统教育制度不因之而更变,科举取士的程序也原封不动。

这有限目标始终无法获得,原因不难解释。当时人所谓“洋务”,实际为“西方事物”,乃全部西方现代物质文明所产生之后果,缘于社会上注重效率,在各处请求准确之所得。这和中国的官僚组织立场全部相反。后者有了一个庞大的架构,一向站在非竞争性的立场,几百年来只望维持一个大体过得去的标准,以保持内部凝聚力。因生活方式的不同,西方采取重商主义,中国维持农业社会习惯。这习惯的不同,影响到每一件兵器的制造者和使用者,更别提到他们的组织人与协调人。这差异也在每一日发生影响,在每一行动之中发生影响。

这些兵工厂和造船局设立时好像商业组织,可是它们没有相

① 冯钢:《马克思·韦伯:文明与精神》,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②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年版。

对的公司可以发生商业上的关系。他们为制造者,可是社会上没有材料与零件供应者和推销员。它们与外面有来往,其关系也松懈。组织中的账目无从认真核算。他们也无从编制预算,因为政府本身尚无预算可言。人事的管制必漫无标准,因为中国全部的经济生活即缺乏人事管制标准。^①

这就注定了“洋务运动”的悲剧命运。1885年中法之战,中方一败涂地,丧失了大片土地和主权。而1894年甲午一战,竟然被曾为中国“进贡”之国的日本打败,朝野上下备尝国耻。甲午战争的挫败,不仅使清廷颜面扫地,民族自信心受挫;战后的割地、赔款更使中国从此成了列强的俎上肉,变法图强的主张乃在知识界中日益高涨。从甲午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的中国,在保守派、改革派、革命派三种势力互相激荡的情形下,传统的制度、文化、思想等方面都产生了激烈的变化。

“洋务运动”的功过是非虽然难以定评,但随之出现的设立译书局,派遣留学生的活动,却开始了一次从体内深处进行的换血手术。以林琴南为代表的旧译小说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里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无形中输进了各种随之而来的零乱的现代思想。那时的翻译类似抓阄,抓到哪本就译哪本。作为翻译家的林琴南从印书馆里预支稿酬,比起一般人来高得惊人;在饮酒之余,拿起印书馆选来的小说,毫不犹豫地之乎者也下去。后继者为一批留洋归国学生。这些学生在国外大量地接触了西方各国的文学作品,受到了极大的艺术熏陶;像鲁迅、周作人兄弟这样的人,甚至在国外就翻译了不少作品。以这批留学生为主的翻译力量,也在不遗余力地抛出各种文化典籍的译本。这些是没有系统的,对于他们来说,陌生了几百年的西洋文明,简直是一堆堆金山银山,随手一抓就是一大把。那时,包括俄国在内的欧洲各国文学作品纷纷被翻译过

^①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来,翻译者凭自己的兴趣所至,并没有确定于某国某家;即使各自有崇拜的对象,也各不相同,所以那时的翻译是没有侧重点的,更没有把重点放在俄罗斯文学上。1915年《新青年》创刊之后意识到了这一点,形成了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刘大白、钱玄同等人为核心的团体,逐渐在寻找中国出路的过程中把目光投向俄罗斯。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事实上,中国知识分子的探索之路一直是曲折艰难的,始终伴随苦闷与选择。孙中山时代的民族精英和革命先驱虽然对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尚不能形成今天的科学认识:“中国的首要问题仍是新旧之间不能衔接:现代体制需要所有因素都能在数目字上管理。旧式的组织不以中央为各部分总和的代表,反倒以一种道德上的力量自居,将各部分牵扯出来,也将它们的力量视作彼此相等而互相抵消,于是全体都立于一种微妙平衡的局面里保持表面上的宁静。这种新旧之间的不相融洽已在民国成立时看出。所以帝制必须取消。根据过去的经验,坐在龙椅上的人物虽以道德号召,要不是以出卖旁人作为习惯的老手,即被人愚弄终身。况且皇权之极端与社会组织之无法妥协互相倚重。”^①但他们已经认识到民族的自强不能单恃技术革新,而必须进行彻底的制度和文化革命。

如果说义和团(1899年)打出“扶清灭洋”旗号^②,是把对手做了“外敌”与“内敌”的区分,尚有分别内外、避重就轻的机智的话,孙中山在1894年发起的兴中会的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则带有明显的大汉沙文主义倾向。用胡绳先生的话说:这是把三

①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②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十八章:义和团的勃起。